

2835,710,127 上海法院“数字变革”的数字背后

□记者 胡蝶飞

申报应用场景 2835 个，完成数据建模 710 个，127 个模型嵌入办案系统……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信息中心的电子屏幕上，“数字法院”建设的数据一直在实时更新。

“数字法院建设是司法领域的一场重塑性变革。”“它不仅是场景建设，更是思维方式的彻底转变。”上海高院党组书记、院长贾宇在上海“数字法院”建设推进会上的讲话，引发了记者的强烈好奇。

为什么说这是一场“数字变革”？这一组组数字和场景背后代表着什么？数字究竟如何赋能？对当事人来说又有何意义？带着一连串问题，记者近日走进上海多家法院寻找答案，试图读懂“数字”背后的这场“变革”。

>>> 数字“预警” <<<

钱执行到位了，限高措施却未及时解除？

“吉法官，最后一笔钞票礼拜一已经付到位，啥辰光(什么时候)可以把黑名单解了？格礼拜(这周)要乘高铁出去一趟。”

“系统已经自动提示了，依额（你）限高措施已经解除了，可以买高铁票了。实在不放心，依（你）再查查。”

这是虹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吉旺晟与一起执行案件当事人的对话。

提示吉旺晟的这个“系统”，就是虹口法院参与研发的上海法院“执行完毕未解除限制措施提示预警”应用场景。

在执行案件中，为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法院会依法对被执行人采取冻结银行账户、限制消费等措施。“如果被执行人履行完毕，就需要及时解除相关措施。”吉旺晟坦言，由于限制措施实施存

在“广”和“散”等特点，如何第一时间解除限制措施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

“以前每次案件执行完毕，我们要根据执行卷宗内的材料对已有的各项限制措施逐一进行排查解除，有时还容易有遗漏。”“现在保存结案信息时就会自动收到提示，太方便了。”执行法官告诉记者。

“老百姓到法院是为了解决问题，绝不是来‘走程序’的。”如何解决好当事人的“一件事”？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上海法院深入推进“程序空转”治理，开发了“一事多诉”“撤诉后再起诉”“执行案件”等 40 多个程序空转预警类应用场景。这样的“预警”在助力法官公正高效办案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 数字“质检” <<<

一起民事案件，被告竟已死亡？

“多亏大数据及时提醒，让我避免栽个‘大跟头’。”在一条提示短信中，普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邵莉星感受到了“数字法院”背后蕴藏的巨大潜力。

日前，邵莉星收到一条提示短信：“经‘自然人死亡丧失诉讼主体资格’应用场景的数据模型智能筛查比对，您正在审理的 ** 案件，当事人赵某已于 ** 年 ** 月 ** 日死亡，故诉讼主体资格高度存疑。建议您审慎核实后依法处理，避免出现案件质量差错瑕疵……”

这是起民间借贷纠纷案，当事人赵某是“90 后”，卷宗材料显示，赵某委托母亲代为出庭参与诉讼，委托手续及亲属证明材料都齐全。案子已经过庭审环节，文书也撰写完成，近日就要宣判。“万一被告真已经死亡，那就没有诉讼主体资格、

当事人错列，案子判了就是错案！”邵莉星一刻也不敢耽搁，赶紧联系赵某居住地的社区工作人员，经多方辗转，向属地居委核实，确认赵某已于近期死亡的事实。

当天下午，邵莉星又联系双方当事人到庭谈话，查明赵某母亲因难以接受儿子死亡而伪造委托书的事实，并当庭对其予以口头训诫。最终，经变更追加当事人后，各方当事人协商，案件依法审结。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通常难以在不同诉讼阶段多次逐案查询核实涉诉自然人情况，如遇户籍信息数据更新不及时、当事人家属主动隐瞒死亡信息等特殊情况，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踩“坑”。

截至目前，嘉定法院参与研发的这一“自然人死亡丧失诉讼主体资格提示预警”应用场景已推送提示信息 824 条。

统一”提示预警，发现可能存在量刑偏离合理区间。法官经核查后发现，确实存在罚金适用偏差情况，最终纠正了该差错。

“这些数据应用场景就像一条‘质检’流水线，让在办案件的每个程序节点自动接受‘体检’，并根据规则触发预警提示，持续提升司法质效和公信力，让老百姓更好感受到公平正义。”张能介绍。

数据显示，截至 12 月 10 日，已嵌入办案系统的 91 个应用场景已累计推送提示和警示信息近 1.6 万条，反馈有帮助率近 80%。

>>> 数字“治理” <<<

企业高管追索补偿金700万，税谁来缴？

如果说数字“预警”和数字“质检”是一场对内的“自我变革”，那数字“治理”则是一场真正的内外“破壁”集成变革，让沉睡的数据发挥“动能”。

“法官，我们在履行给付义务的时候，到底要不要代为扣缴个人所得税款？”作为一名劳动争议案件审判法官，静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张静淑经常接到涉诉用人单位打来的咨询电话。

案子判结了，判后执行阶段却遇到问题：判的是税前金额，如果全额给付，那谁来缴纳所得税？若当事人选择自行缴纳，如何监督？

“尤其是在企业高管离职后追索劳动报酬类案件中，因为涉及金额较高，问题尤为普遍。”张静淑告诉记者，“涉案金额少则几十万，数额最高的一个高管，一次性获赔补偿金 700 万元。”

除了部分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外，大多数当事人往往会以已经解除劳动合同为由，拒绝用人单位在给付时代缴代扣个人所得税。

那么，这些案件当事人事后缴纳税款了吗？张静淑试着打了几个电话。“我发现，部分当事人竟真

的没缴纳税款，且数额都不小。”“而涉诉信息，税务部门也比较难掌握和发现。”

经进一步筛查发现，仅静安法院，就有涉嫌获得一次性补偿但并未及时缴纳税款的企业“高管”41 人，涉及应征收税款工资收入 2261 万元。全市法院共发现涉嫌逃漏税款的线索 832 条。

如何补上这个监管“漏洞”？静安法院参与研发了“偷逃税预防数据模型”。

“我们还对近 5 年审结的股权转让‘阴阳合同’案件中涉嫌‘偷逃税’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且同步将相关信息发送至税务部门。”静安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陈家旭告诉记者。

除了建立机制定期推送涉嫌偷逃税案件信息，助力完善税务监管体系外，静安法院还从“源头”着手，向相关案件当事人制发《依法诚信纳税告知书》等。

作为一名基层法官，平时工作量已经“满额”，为何还有动力参与数据建模？“能够将审判后的一些思考总结转化为数据‘成果’，助力社会治理，我觉得很有成就感，也很有价值。”张静淑说。

>>> 数字“变革” <<<

司法公共数据与社会治理数据“破壁”

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丁戈文看来，“数字法院”场景以数字赋能社会治理，推进诉源治理，实现由“办案”到“治理”的“变革”，是能动司法的最佳注脚。

“以前，法院延伸审判职能参与社会治理，多是通过司法建议或白皮书的方式，有点‘单打独斗’，零散且易重复。”丁戈文说，通过唤醒“沉睡”的司法数据，将零散的“拼图”组合起来，可以更完整看到社会问题的“全貌”和脉络，掌握底层规律，发现治理漏洞或风险，为决策者提供建议。

比如，松江法院研发了“机构养老服务行业的风险防控与综合治理”场景，对近 5 年来养老新业态企业的 579 件民事纠纷案件情况进行分析后，梳理发现一些打着医养康、度假养老基地等旗号的企业经营易出现异化，引发“名为养老实为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问题或金融监管风险，遂提出健全市场准入及经营监管机制等对策建议，帮助监管部门进一步制定完善相关工作机制。

“除了决策参考报告类应用场景，数字法院助力社会治理还包括司法数据推送类和司法数据查询类场景。”丁戈文介绍。

上海法院针对网约车治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民营企业融资等社会治理薄弱环节，为社会治理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线索依据，进而帮助做好决策判断和风险防范，推进“抓前端、治未病”，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

“我们对过去五年 300 余万份裁判文书及起诉状、答辩状等电子卷宗进行全面解构，唤醒海量沉睡数据，形成了 7.8 亿多个解构数据点。”在上海高院信息中心，信息处处长陆诚一边演示一边介绍。“此外，我们还打通了外部数据壁垒，主动对接上海市大数据中心，线上实时申请使用公共数据，实现外部数据共享共用。”

而这些蕴含社会治理价值的司法公共数据，通过形成推送给职能部门，或供职能部门查询的应用场景，解决数据壁垒、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治理盲点、难点和堵点。

目前，上海“数字法院”已将涉及企业注销、人口死亡、社保信息变更等 140 余类数据用于场景化建模，推动内外部数据系统集成，助力社会治理。

“上海法院将把‘数字法院’建设作为推动审判工作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持续向纵深推进，努力把上海‘数字法院’建设成为新时代司法模式变革的上海样板。”贾宇表示。

累计推送提示信息1.6万余条，有助率近80%

上海“数字法院”建设推进以来，类似这样的“自查自纠”场景不在少数。

从审判实践中常见的适法不统一、自由裁量权行使不规范，到易发的诉讼主体错列、裁判文书法条引用错误或表述不规范……都建立了排查、预防瑕疵等应用场景。

“我们将应用场景建设融入审判执行全流程，助力办案。”上海高院审管办副主任张能举了个例子，比如浦东法院法官在审理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案件时，经“知识产权销假刑事类案量刑适法